

中國歷代哲學文選

宋元明編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
編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

中國歷代哲學文選

宋元明編

中華書局

中國歷代哲學文選 宋元明編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國工業出版社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10 1/4印張·196,000字

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6,001—30,350 (內“K”10,050) 定價: (6) 1.00元

統一書號: 2018·85 62.11. 京型

中國歷代哲學文選編輯說明

本書是爲初學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讀者編輯的。由於我國有悠久的歷史，哲學史、思想史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批判其糟粕，宣揚其精華：這對於繼承祖國文化遺產，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都有很大的幫助。

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必須相當地掌握原始資料。只有在觀點和資料的統一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理解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發展的內容和規律。由於我國古典文獻的繁多和古代文字的艱深，在掌握資料方面，初學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人有很多困難。爲了幫助克服這些困難，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和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曾分別編選了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和中國哲學史參考資料，但是對於初學的人篇幅還是嫌多，因此，我們又編選了這部文選。

這部文選收集了從先秦到近代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的著作，也包括歷史上影響較大和具有代表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

作。通過這些著作，讀者可以初步了解我國歷代哲學家、思想家的基本觀點，也可以初步看到我國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思想鬥爭的基本輪廓。

爲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著作的內容，我們對所選各篇中比較難懂的辭句都作了簡明的注釋，兩漢以前的作品還譯成了現代漢語。其中篇幅較長的則適當地作了刪節。但我國歷史上的哲學著作，絕大部分都是用當時的文言文寫的，跟現代漢語有很大的距離；用以表達哲學思想的詞彙和術語，又有許多不同的特點和涵義。因此，將歷史上的哲學著作確切地譯成現代漢語，或者作出合乎現代需要的科學的注釋都比較困難。我們這裏所做的，僅僅是一個嘗試，只不過是爲讀通原文有困難的讀者引路。

此外，爲了幫助讀者了解這些哲學家、思想家的生平、著述和思想，我們對所選各家都作了簡要的介紹。這些介紹只可作爲參考，其中許多問題還須作進一步的研究。

這部文選共分爲四個分冊：

一 先秦編

二 兩漢——隋唐編

三 宋元明編

四 清代近代編

這部文選是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和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共同負責編輯的。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担任先秦到隋唐部分，中國哲學史組担任宋元明到近代部分。文選中所選各篇的譯文和注釋，有一部分是在中國哲學史組主編的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由中華書局出版）原稿的基礎上修訂而成，一部分是編者新作的。中華書局編輯部，在定稿前又對全部稿件作了一次加工整理。

參加這部文選的編選、翻譯、注釋、說明以及校訂和審查工作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方面有：王明、王範之、王維庭、王維誠、吳則虞、容肇祖、烏恩溥、陳克明、程靜宇、喻培厚、郭雲鵬、鍾肇鵬等。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方面有：任繼愈、朱伯崑、湯一介、張岱年、馮友蘭、鄧艾民（均以筆劃先後爲序）等。中國哲學史組担任的部分是由容肇祖、陳克明、程靜宇等負責編輯整理的。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担任的部分是由朱伯崑負責編輯整理的。

這部文選除可供中國哲學史教學參考之外，也可供對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有興趣的幹部閱讀參考。

編者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錄

中國歷代、哲學文選編輯說明

宋元明編

李 觀 一

平土書序 六

原文 八

潛書十五篇 一〇

邵 雍 二

觀物內篇 一五

觀物外篇 二一

周敦頤 二九

太極圖說 三四

通書 三六

張載 三九

正蒙太和篇 四七

正蒙參兩篇 五五

正蒙神化篇 六二

正蒙動物篇 六六

正蒙乾稱篇 六九

西銘 七六

王安石 八一

洪範傳 八六

禮樂論	九五
道德經注	一〇四
老子	一二二
太古	一二四
答曾子固書	一二四
程顥	一二七
答橫渠先生定性書	一二三
語錄	二六
程頤	三〇
語錄	三八
朱熹	一四四
大學章句序	一四九

補大學格物致知傳 一五一

述程子論格物 一五二

朱子語類 一五四

陸九淵 一六一

雜說 一六五

語錄下 一六六

陳亮 一七四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一八一

甲辰答朱元晦書 一九八

葉適 二〇九

財計上 二二三

習學記言 二二六

鄧牧	三〇
君道	三四
吏道	三七
羅欽順	三九
困知記	三五
答歐陽少司成崇一	三四
王守仁	二四七
傳習錄上	二五三
傳習錄中	二五七
傳習錄下	二六〇
王廷相	二六四

慎言	二七一
雅述	二七五
石龍書院學辯	二八一
王良	二八四
語錄	二八八
答問補遺	二九二
明哲保身論	二九五
李贄	二九八
答鄧石陽	三〇五
答耿中丞	三〇七
夫婦論	三一〇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	三三二

李觀

李觀字泰伯，宋建昌軍南城人。生於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年），死於仁宗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家貧好學，以教學爲生，從學者常數十百人，被稱爲盱江先生。仁宗皇祐二年（一〇五〇年），以范仲淹薦爲太學助教，後爲直講。著有盱江文集（或稱直講李先生文集）。事迹詳宋史卷四三二儒林傳及附見宋元學案卷三高平學案。這裏選平土書序、原文及潛書十五篇。

李觀的哲學思想，有不少唯物主義的因素。這些因素，主要表現在他的易論和禮論等論著中。在易論中，表述了他對易理的看法。他再三說他寫的易論，是根據王弼的注，以解義，目的在「急乎天下國家之用」，是要使「人事修而王道明」。因此他對當時廣泛流行的「釋人事而責天道」的劉牧易數鉤隱圖，認爲是「傀異」、「誕護」、「貽誤學者」，不得不加以刪訂。他從平凡實際的人事解釋易義，拋棄象數迷信的邪說，對於「挾左道以亂政」和「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的「非史非巫、言稱運命」的人，主張予以嚴禁（參見文集卷四刪定易圖序論六）。他認爲五行萬物之所以生，是由於陰

陽二氣之會合。他說：「夫物以陰陽二氣之會而後有象，象而後有形，……天降陽，地出陰，陰陽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文集卷四刪定易圖序論）這就肯定了世界的物質性。同時，他也接觸到了事物發展變化的問題。他說：「常者，道之紀也；道不以權，弗能濟矣。是故權者，反常者也。事變矣，勢異矣，而一本於常，猶膠柱而鼓瑟也。」（文集卷三易論八）又說：「排患解紛，量時制宜，事出一切，愈不可常也。」（同上）他看到了「常」和「權」的對立，也就是常住性和變動性的對立，所以要反對膠柱鼓瑟，主張量時制宜。

在禮論七篇中，李觀對於「禮」的起源及其內容作了一些與神祕主義相反的解釋。他說：「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爲之節文者也。」認爲禮不過是根據人類的性欲出發而產生的節文，這是對荀子「禮以順人心爲本」（荀子大略篇）的思想的發揮。又說：「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蓋皆禮矣。」他還認爲禮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產物，是關於人類社會生活秩序和社會關係的規定。同時，禮也包括與此相聯系的政治、法律、音樂以及道德等，與上層統治階級把禮當做絕對教條的傳統看法不同。另外，他在禮論第六裏還公

開提出「庶人喪祭皆有禮」，來駁斥「禮不下庶人」的傳統偏見，認為所謂「禮不下庶人」是「迷曲禮者之妄」。這種對傳統觀念的大膽攻擊，顯然是代表了當時庶族地主階級要求提高政治社會地位而發出的呼聲。

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李觀和王安石一樣，提出了許多改良主義的主張。王安石說：「李泰伯……某與納焉」（臨川文集卷七七答王景山書），可見他和王安石有交遊。他比王安石大十一歲，又同是江西人。他的學生鄧閏甫並且參加過王安石的變法。他們在思想上有某些共同點是可能的。

李觀的著作中，很多涉及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實際問題。他主張正視人民的「利」和「欲」。在原文篇裏，說「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如果以為人們不可以講利欲，就等於「賊人之性，反人之情」。因此，他認為孟子說的「王何必曰利」的話，未免偏激。他說，合乎「仁義」而不「利」的事情，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這樣，他就把「仁義」和「利欲」密切地結合起來了。

此外，他的常語，主要是批判孟子的著作。在王霸論上，他也不贊成孟子的見解。他認為王道和霸道的區別，並不在於一個純粹一個駁雜，霸道也有可取，不可看輕。漢唐也是王道，不能稱為霸道。

在平土書序和潛書裏，他主張平均土地，恢復周禮的井田制。他認為「生民之道食爲大」；天下沒有不耕的田，而耕田的人卻不免於飢餓，原因在於土地不爲耕者所有，所以結果是富家多財富而傭耕的男女受飢寒。

在富國篇第六和第五裏，他也是從經濟的觀點出發來看問題的。前者對穀價貴賤的理論闡述得極爲詳盡透徹，對於在大商富賈重利盤剝下的農民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是上承管子輕重諸篇下開王安石青苗諸法的一篇極有價值的經濟論著。後者主要反對佛教和道教，贊同韓愈原道篇所提出的「民不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則誅」的意見，要把和尚道士都改造爲農業生產者，以實現其「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耕，一步一畝無不稼」（國用篇第四）和「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衆之殃，政之害也」（國用篇第三）的主張。

由上所述，李觀思想中有素樸的唯物主義因素，又強調人民的利欲問題，注意土地問題和穀價問題，表示對廣大人民的同情，可以說是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他的同情也有一個界限不可踰越，那就是他所認為「人道之準、世教之主」的「禮」。他雖然承認「禮之初」是「順人之性欲而爲之節文」的，但他從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竭力提倡「禮」的教化作用，重視君臣、上下、公卿、大夫、士、庶人的區別，把禮看作不僅是維

護封建政治和法制的工具，而且是鞏固封建社會一般社會秩序的工具。

在哲學思想方面，他看到了世界的物質性，反對劉牧一派的「非史非巫，言稱運命」的邪說；但在另外一些文章裏，卻頌揚五通神的靈驗，說「雖寶龜泰筮，弗是過已」（文集卷二十四邵氏神祠記）；又以他自己和他的母親會先後夢見過神仙，證明他「生有自來」（文集卷一疑仙賦）。可見他並沒有能成爲徹底的無神論者。在發展變化問題上，他看到了「常」和「權」的對立，但沒有把「權」看成是絕對的，而把「權」看成是相對的，所以他說：「常者道之紀也。」又說：「時雖異矣，事雖殊矣，然事以時變者其迹也，統而論之者其心也。迹或萬殊，而心或一揆也。……時既屢遷，迹亦皆變，苟不求其心之所歸，而專視其迹，則散漫簡策，百紉千結，豈中材之所了耶？……然則統而論之，不亦可乎？」（文集卷三易論十一）把心和迹也對立起來，以「一揆」的心應「萬殊」的迹，以「統而論之」應「百紉千結」，最後，仍歸結到「分有所定，義不可去，則莫若守正之爲利也」（文集卷三易論第六）。這就又陷入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泥坑去了。

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他既主張「強本節用」，力勸皇帝躬行節儉，損上益下，以減輕人民的負擔，但跟着又說：「儉非聖人之中制」，認爲周禮中的「六寢六宮」等等完全合理，而「茅茨土階」，則是「非聖無法」；主張「王及后之用財皆不會計」，爲封建